

海内外中国戏剧史家自选集

赵山林卷

康保成 主编

赵山林 著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大象出版社

海内外中国戏剧史家自选集

赵山林卷

康保成 主编

赵山林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内外中国戏剧史家自选集·赵山林卷 / 赵山林

著.— 郑州 : 大象出版社, 2017. 12

ISBN 978-7-5347-9216-8

I. ①海… II. ①赵… III. ①戏曲史—中国—文集
IV. ①J809. 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80072 号

海内外中国戏剧史家自选集·赵山林卷

HAI NEI WAI ZHONG GUO XI JU SHI JIA ZI XUAN JI ZHAO SHAN LIN JUAN

赵山林 著

出版人 王刘纯

总策划 王刘纯 张前进

项目统筹 吴韶明

责任编辑 陈 灼

责任校对 毛 路 李婧慧 牛志远

装帧设计 付铁锁

出版发行 大象出版社(郑州市开元路 16 号 邮政编码 450044)

发行科 0371-63863551 总编室 0371-65597936

网 址 www.daxiang.cn

印 刷 郑州新海岸电脑彩色制印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8.25

字 数 447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89.00 元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 郑州市文化路 56 号金国商厦七楼

邮政编码 450002 电话 0371-67358093

总序

康保成

自王国维(1877—1927)《宋元戏曲史》(1913)发表后的百年来,旧有的文学观念、戏剧观念不断被颠覆被更新。

最初,人们似乎如梦方醒般认识到:元曲原来是可以和楚骚、汉赋、唐诗、宋词并驾齐驱的“一代之文学”;被人轻视的金元杂剧和宋元南戏,曾经有过无比辉煌的历史。渐渐地,王国维重文学轻艺术、重元曲轻明清戏曲的观念受到反思。人们从明清传奇的持续繁荣,昆曲折子戏的兴起,花部戏曲的崛起,“角儿制”的确立,已然认识到戏剧的表演艺术本质。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戏剧与宗教仪式的关系问题吸引了学者们的注意,戏剧史的“明河”与“潜流”分途演进的理念被提出。这一理念目前正在经受时间与实践的检验。

百年来的中国戏剧史研究,涌现出一批又一批优秀的学人和丰厚的学术成果。

王国维的同时代人吴梅(1884—1939)和齐如山(1875—1962),分别在昆曲音律和京剧舞台表演方面获得举世公认的成就,乃至有学者把王、吴、齐并称为近代戏剧理论界的“三大家”或“三驾马车”。无论这一称谓是否被多数人所接受,但吴梅竭力提倡“场上之曲”和齐如山对梅兰芳表演艺术的指导,都在揭示出戏曲的角色扮演本质的同时,充分认识到作家作品与场上表演互为依存的密切联系,认识到戏剧史上存在着一个从“一剧之本”向“表演中心”的演进过程。王、吴、齐分别代表了戏曲研究的三种路向是毫无疑问的。当然,“三大家”中,王国维重文献、重考据的研究路向影响最大,追随者最多。

“三大家”之外或稍后，涌现出郑振铎（1898—1958）、任中敏（1897—1991）、孙楷第（1898—1986）、黄芝冈（1895—1971）、钱南扬（1899—1987）、冯沅君（1900—1974）、周贻白（1900—1977）、卢前（1905—1951）、赵景深（1902—1985）、王季思（1906—1996）、董每戡（1908—1980）、郑骞（1906—1991）、傅惜华（1907—1970）、庄一拂（1907—2001）、张庚（1911—2003）、张敬（1912—1997）、汪经昌（1913—1985）、吴晓铃（1914—1995）、郭汉城（1917—），以及近年谢世的蒋星煜（1920—2015）、徐朔方（1923—2007）、胡忌（1931—2005）等戏剧史家。中国戏剧史的研究领域里，可谓群星璀璨，光照寰宇。

卢前在20世纪30年代写的《中国戏剧概论》里，把中国戏剧史比作“一粒橄榄”：两头细小的部分说的是“戏”，中间饱满的部分是“曲的历程”。这一生动的比喻，大致勾勒出中国戏剧史研究领域的成果与不足。当时的戏剧史家，大多是从文学、文献学的角度从事研究的，他们所取得的成就，也主要在宋元以来的戏曲作家和作品方面。王国维的文学观、戏剧观和戏剧史观，对这代人的影响一目了然。用注经的观念与方法注戏曲、搜集文献资料、研究戏剧史，其积极意义无论如何估计都不会过高。不过20世纪40年代以后周贻白、董每戡、任中敏、张庚等人的研究，扩大了戏剧史的研究领域，突破了“曲本位”的局限，弥补了前人对“戏”研究的不足，或许更值得称道。

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和日本汉学有着割不断的联系。一方面，日本汉学对王国维的戏曲史研究或多或少有着启发作用；另一方面，《宋元戏曲史》问世之后，又极大地反哺于日本汉学。森槐南（1863—1911）等人在大学讲授包括戏曲在内的中国俗文学以及开展南戏研究，是在《宋元戏曲史》问世之前，而由狩野直喜（1868—1947）开创，青木正儿（1887—1964）、吉川幸次郎（1904—1980）、田中谦二（1912—2002）、岩城秀夫（1923—）等人继承的“京都学派”，却深受王国维的影响。出身于大东文化大学的波多野太

郎(1912—2003)独辟蹊径,他较早从地方史志中寻觅戏曲、小说的词语史料,颇受关注。而过听花(1868—1931)、波多野乾一(1890—1963)、滨一卫(1909—1984)等人,着眼于京剧现状的品评,其论著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和史学价值。田仲一成(1932—)的祭祀戏剧研究,从领域到方法,都具有戏剧人类学的风范,对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大陆的戏剧研究影响较大。

欧美研究中国戏剧史的著作很可能在《宋元戏曲史》之前已经出现。据《清稗类钞》介绍,英国博士瓦儿特的《中国剧曲》一书,把中国戏剧的发展分为唐、宋、金元、明四个时期,已经明显具有了“史”的意识。不过运用现代学术规范进行深入研究并取得显著成果的,还要数后来的柯润璞(James Irving Crump,Jr.,1921—2002)、龙彼得(Pier van der Loon,1920—2002)、白之(Cyril Birch,1925—)、韩南(Patrick Hanan,1927—2014)、杜为廉(William Dolby,1936—2015)等人。他们的研究路数不完全相同,但其成果先后传到了中国,影响了中国。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韩国的中国古代戏剧研究比欧美、日本慢半拍,金学主(1934—)及其门生撑起了朝鲜半岛的一片天,这已经到了20世纪快要降下帷幕的时候。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近30余年,是中国大陆的“新时期”。这既是在政治上的新时期,也是学术上的新时期。而我们,是新时期的见证者和参与者。然而,当年踌躇满志的青涩学子,倏忽之间,就被时光染白了双鬓。蓦然回首,我们这一代做了什么?

有感于此,大象出版社社长王刘纯先生委托我主编“海内外中国戏剧史家自选集”丛书,对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戏剧史研究做一番检阅。当我战战兢兢地接下这个任务之后,才发现,以自己的微薄之力,要达成既定目标是多么不易!丛书主编,应该是德高望重的学术权威,而自己的学术水平和学术威望都远远不够。再从客观上看,丛书只能收论文,而一些有分量的学术成果往往是以专著的形式出版的;加之一些著名学者已经或正在出版自选集

或文集，无法为本丛书供稿。更重要的是，由于篇幅所限，众多优秀的中青年学人及其成果未能入选。

尽管如此，我们依然对本丛书充满了信心。

首先，本丛书作者的年龄大致在 50 岁到 80 岁之间，分布在中国大陆、港台地区和日本、韩国、新加坡、欧美。他们都是近 30 余年来活跃在中国戏剧史、中国古代戏剧研究领域第一线的优秀学者。入选本丛书的论文经作者精挑细选，代表了近 30 余年来海内外中国戏剧史研究领域的最高水平。其中海外学者的论著，更可使大陆读者耳目一新。

其次，本丛书所涉及的戏剧文体，从诸宫调、院本，到金元杂剧、宋元南戏、明清传奇、花部戏曲、民间小戏、祭祀戏剧，其覆盖面非常广泛。不仅如此，本丛书所讨论的问题，除古典戏剧理论本身和古代戏剧史实、作家作品的考证外，还有戏剧的本质，中国戏剧的起源、形成、成熟，剧本与表演的关系，中国古代有无悲剧，宋元戏曲在当代的流传，中国戏曲在海外的传播，花部戏曲的表演理论，祭祀戏剧与娱乐戏剧的关系等重大理论问题。本丛书各卷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以文献考据、理论分析为主，有的本身就是戏曲文献研究，但也不乏文献与文物、田野调查相互参证的带有民俗学、人类学色彩的佳作。

再次，本丛书每卷卷首，都有该卷作者的学术自述或访谈录等。由于本丛书即将面世，此处恕不一一列出他们的姓名。读者，特别是年轻读者，可从中领略他们的风采，学习他们的经验，复制他们的成功之路，甚至超越他们，成为新一代的学术旗帜。

学术界的新老交替，从来都是一种必然的新陈代谢现象。然而所谓“新老交替”不是新一代否定老一代或者取代老一代，而是后人站在前人肩上，由于站得更高，才能看得更远。前辈的有些结论，可能成为定谳，永远也不过时；前辈提出的绕不过去的话题，当然也可以说了再说；前辈的疏失应该纠正。更重要的是，前辈没有说而应当说的话题，应该由年青的一代提出

来。这才可以印证克罗齐的那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陈寅恪先生曾经提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那么，什么是中国戏剧史领域里的“新材料”与“新问题”？最近，美国歌手鲍勃·迪伦（Bob Dylan）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轰动了世界，再一次引发人们对文学本质的思考；同时，也启发我们重新思考“什么是中国戏剧史领域里的‘新材料’与‘新问题’”。

在原始社会，人们唱歌、跳舞，但是不写诗，因为那时候没有文字。同理，史前时代的人也演剧，而且有文字之后多数中国戏剧演员并不识字，戏剧演出主要是以口传心授的方式传承与传播的。然而，长时间以来，人们陷入了文字与文献崇拜的陷阱不能自拔，乃至文献考据一直成为文学史、戏剧史研究中最受推崇、最有效接近历史真实的研究方法。质言之，如果戏剧史研究领域有“新材料”的话，那一定不是文献，至少不仅仅是文献。

本文开头提到，戏剧史的“明河”与“潜流”分途演进的理念正在经受时间与实践的检验。所谓“明河”，主要指的是从宋金杂剧、宋元南戏直到花部戏曲的有剧本的历史。所谓“潜流”，主要指的是长期处于文化边缘位置的不依附于剧本而存在的民间小戏和祭祀戏剧、仪式戏剧。在中国，这两种差异极大的戏剧形态虽时有交集，却始终不曾汇入同一条河道。30余年来，作为祭祀戏剧之一的傩戏曾经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并产生出一批高水平的研究成果。然而，此类成果进入戏剧史的主流与中心的位置，却依然来日方长。与此相应，田野调查的研究方法与口述史料的运用，如何与传统的文献考据实现对接，如何把戏剧史的时间顺序与逻辑顺序厘清理顺，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国际知名戏剧导演尤金尼奥·巴尔巴（Eugenio Barba, 1936—）开创了以形体动作为研究对象的戏剧人类学，其理论渊源可上溯到格洛托夫斯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乃至亚里士多德。然而，对于戏剧史的研究来说，这些对

包括中国京剧在内的形态动作的研究究竟具有什么实际意义,还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如果,我们能够凭借现代科技手段,让新疆呼图壁岩画上的人物活起来,让那些表演故事的汉代画像石活起来,让宋辽金元的戏剧演出壁画、画像砖活起来,才真正弥补了本丛书的遗珠之憾,开创出了戏剧史研究的新天地。

但愿我们的设想不是异想天开。《清明上河图》不是已经动起来了吗?我们坚守着梦想,因为有梦就有希望。我们期待着。

2017年1月4日
于广州大学文学思想研究中心

融会贯通，追求原创

——戏曲研究的点滴体会

本人与戏曲似乎有着不解之缘。我祖籍邗江，即今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小学和中学时代在安徽省安庆市度过：这两处都在长江边，而且都是著名的戏曲之乡。清代中叶徽班艺人就是从安庆出发，中经扬州，走向北京，走向全国的。1968年从安庆一中毕业之后，我到安徽省潜山县插队落户，这里是“京剧鼻祖”，“前三鼎甲”之首程长庚的故乡。潜山的邻县一个是怀宁，“同光十三绝”之一的杨月楼的故乡，其子杨小楼更是声名赫赫的“国剧宗师”“武生泰斗”，而海派京剧的代表人物、“红生鼻祖”王鸿寿（三麻子）及夏月珊、夏月润昆仲祖籍均是怀宁；一个是太湖，富连成科班创始人叶春善的故乡；一个是桐城，与“前三鼎甲”齐名的京剧“老四家”之一的王九龄的故乡，黄梅戏大师严凤英的故乡亦是桐城；还有一个是岳西，明代中叶风靡全国的青阳腔的遗脉——岳西高腔就存在于此。这几个县都是安庆的属县，可以看出，这里是名副其实的戏窝子，传统戏曲的文化底蕴极为丰厚。此外，还可提供有关家学的一个细节：先严璧还公亦为京剧行家。1944年6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到兰州访问，先严当时在兰州银行供职，他们几位京剧票友曾为欢迎华莱士演出过《四郎探母》，先严饰演杨四郎。

我于1982年初从安徽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随即进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师从著名词曲专家万云骏教授，攻读硕士学位。万先生是词曲大师吴梅先生的弟子，对于词曲有着精深的造诣。1928年春至1931年秋，词曲大师吴梅先生曾在光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前身）任教，著有《中乐寻源》的童斐以及吴梅的学生卢前也曾在光华大学任教，因此华东师范大学的词曲研究可以说是渊源有自。我在万先生门下学习3年，又有幸在各种场合聆听了许多学界前辈的教诲，这为我此后研究打下了基础。毕业后留校任教，30多年来的学术研究中，不断向前辈和同行学习，取得了一些成绩，也积累了点滴体会，不揣浅陋，写出来向专家和广大读者请教。

一、把原创性作为学术研究的主要追求

学术研究贵在独创,我们的研究工作是否有价值,最重要的是要看研究成果是否在前人基础上或多或少有所开拓、有所发现。个人的力量有限,但我们应当把原创性作为学术研究的主要追求,这是没有疑问的。这里想谈谈我在戏曲观众学研究中的一点体会。

20世纪80年代,随着戏曲市场发生的变化,观众问题已经引起我国文艺界、理论界的关注。但当时所做的工作,主要还是介绍国外的研究成果,如1986年,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论观众》,收入国外学者有关观众问题的论文,而对中国戏剧观众问题则研究者不多。特别是对于中国戏曲观众问题,更是很少有人进行研究,对于源远流长的中国戏曲在其发展过程中所积累的丰富的有关观众问题的资料,因为尚未认识其价值,亦无人进行系统的发掘、整理、探讨和研究。这引起我对戏曲观众问题的关注。

我研究戏曲观众问题的目的,是要通过实事求是的研究,为建立中国戏曲观众学投石探路,为富有民族特色的戏曲学、艺术学和文艺理论的建设添砖加瓦,同时为今天社会主义戏曲和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一份有益的借鉴。基于这一目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在广泛搜集资料、阅读有关理论书籍、深入思考研究的基础上,先后写作和发表了《古代曲论中的观众心理学》《古代曲论中的观众位置论》《戏曲观众的心理定式》《戏曲艺术创造中的信息反馈流程》《论古代戏曲民俗》《徽商与戏曲的关系》《论戏曲观众审美趣味和审美层次的差异性》等多篇论文,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戏曲观众问题进行研究探讨。在此基础上,于1990年出版了专著《中国戏曲观众学》。

《中国戏曲观众学》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剧场与观众”着重于戏剧学与社会学、民俗学的交叉研究,分八章详细探讨了剧场的类型和变迁、古代至近代戏曲观众的构成和变化,还包括群众性的戏曲活动和丰富的戏曲民俗。下编“观众心理学”着重于戏剧学与心理学的交叉研究,依据中国古代曲论等方面大量的书面资料和戏曲文物,分七章详细探讨了古人对观众心理的认识、观众的心理定式、观众的心理因素、以观众为主体的信息反馈流程、观众审美趣味和审美层次的差异性、戏曲审美效应的多样性以及观众审美趣味的历史可变性等问题。在研究过程中,坚持实事求是,力求通过丰

富现象的研究探索,得出有规律性的结论。

在具体方法上,还采用了数量分析和比较的方法。如第十三章,在分析观众审美趣味和审美层次的差异性的时候,分析了明万历二年(1574年)手抄本《迎神赛社礼节传簿四十曲宫调》、明万历三十年(1602年)刊本《精刻绣像乐府红珊》和明末清初李玉传奇《永团圆》中所载三份剧目的类型构成,列表详细说明,并对三者进行了比较。这一分析很能说明问题,因此被有关学者引用。第一章还依据有关资料,分析了清代常熟地区一次乡间演出的观众构成,得出男观众、女观众、各类小贩之比大约为5:2:1。这样的分析,也很能说明问题。

书中运用的资料,相当大一部分是我本人长期以来搜集的第一手资料。我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从各种总集、别集、笔记、小说、方志、家谱、碑刻中广泛搜集有关资料,有不少新的发现。其中一部分经过整理考释,编辑成书出版,如《安徽明清曲论选》(黄山书社,1987年)、《历代咏剧诗歌选注》(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未出版的资料数量更大。这些资料中,有很多是前人未曾注意过的,如咏剧诗,总数量超过一万首,其中一部分具有宝贵的价值,经过我的介绍,目前已为海内外学术界所重视。

书中运用资料的另一个特点是及时运用新发现的文物资料。如明万历二年(1574年)手抄本《迎神赛社礼节传簿四十曲宫调》,是1986年在山西潞城县发现,1987年公布的,本书及时加以研究和运用,这使我成为全国最早注意到这一文物价值并及时加以研究的学者之一。

研究方法的科学和资料来源的可靠,使该书的学术质量有了保证。

对于戏曲观众问题,书中提出了我自己的一些观点。

(1)从总的观点来说,过去人们研究戏曲,大多重视剧作家、导演或演员,很少注意观众,本书强调观众是戏曲绝对不可忽视的一大要素,明确提出:没有观众,特别是没有民间观众,就没有中国戏曲,就没有中国文化艺术史上这辉煌的一页。这一观点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2)书中运用丰富材料证明了一个被以往研究者忽略的事实:从宋元瓦舍勾栏时期开始,戏曲艺人就有着比较明确的观众意识。这是我们今天研究戏曲观众学的一个基础,对其中蕴含的文化意义和理论意义不可小看。

(3)书中较早对戏曲观众进行了分门别类的细致研究,如揭示了祭神赛会与村镇观众的关系;将商人与军士作为两个特殊的观众群体单独提出,揭

示了商业活动、人口迁徙与戏曲艺术的关系；将妇女作为一个特殊的观众群体单独提出，分析了历史上妇女观剧的种种禁忌，探索了妇女观众队伍顽强生长的历程；等等。

(4)该书依据古代曲论的材料，以“演者不真，则观者之精神不动”“填词之设，专为登场”和“人赞美而我先之，我憎丑而人和之”来概括古代艺人、剧作家和教习对观众的认识。

(5)该书将戏曲观众的心理定式概括为“既不‘泥真’，亦不‘认假’”“既要看戏，又要看艺”“心灵默契，约定俗成”“善善恶恶，是非分明”四个方面，比较全面，比较深入，提法也是新颖的。

(6)对于观众在戏曲审美过程中的感知、注意、想象、理解等心理活动，该书用“真与幻”“常与奇”“一与变”“有与无”“情与理”加以概括，具有民族特色。

(7)该书将戏曲演出场所视为一个整体，认为其中存在着观众与作者、演员与作者、观众与演员、演员与演员、观众与观众之间的信息反馈流程，这一概括比较全面，比较深入。

(8)该书在讨论观众审美趣味和审美层次的差异性的时候，借用古代曲论的提法，将其概括为“不同观众眼中的‘曲之亨屯’”，并对几份剧目的观众数量关系进行比较分析，这一视角是比较独到的。

总之，以上观点，对中国戏曲观众学的总体或局部的某一问题提出了独到见解，具有学术价值。

该书有关章节以单篇论文形式发表之后，引起学术界关注，其中《古代曲论中的观众心理学》《戏曲观众的心理定式》等篇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该书出版以后，在学术界引起了一定反响。

在大陆，报刊发表了多篇评论文章。权威的《中国曲学大辞典》（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将《中国戏曲观众学》视为有代表性的论著，为其列了专条，在简介该书内容后，评价说：“本书论述新颖，在戏曲史研究中有一定的开拓性。”

在对20世纪学术进行回顾总结的时候，不少学者提到该书。赵敏俐、杨树增著《20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四章“20世纪末叶古典文学研究的辉煌”列举“让人耳目一新的学术著

作”，包括了此书。

在台湾，台湾大学教授李惠绵 20 世纪 90 年代初编著的《戏曲要籍解题》(台湾正中书局，1991 年)，选择标准很严，《中国戏曲观众学》亦被列入其中，评价说：“本书从观众学的角度立论，为中国戏剧理论展开另一层面的研究。”

在国外，日本山口大学教授根山彻发表长篇评论文章，指出“该书中作者对戏曲文本的研究和语汇等方面的研究与以往的文学史研究迥然不同，以往没有将戏曲的接受者纳入研究领域，而该书则对此详加考察展示，就此而言值得高度评价。尤其是其中清晰地阐述了各阶层之不同接受状况，以及戏曲创作方面、演出方面与观众之相应关系。此外，该书提示了作为该方面研究之基础的丰富资料，可以确信它们对于今后的戏曲研究大有裨益”，因此该书“令我们难以等闲视之”^①。

从对艺术实践的指导来说，该书也产生了一定影响。著名京剧演员于魁智在中国京剧优秀青年演员研究生班毕业论文《浅议京剧市场》中多次引用该书的有关论述，并结合梅兰芳、杨宝森、李少春等老一辈艺术家的艺术道路及他本人的艺术实践，作了阐述，反复强调了把握观众心理、适应观众需求、不断进行艺术创新的必要性^②。本人的研究成果，能对艺术实践发挥一点作用，我是感到特别荣幸的。

二、为运用中国理论“话语”建设中国民族戏剧理论略尽绵薄

中国古代戏剧研究从 20 世纪初王国维开山以来，日益成为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研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重要领域。在将近一个世纪中，戏剧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但研究者的研究重点通常放在戏剧文本，对于戏剧的其他构成因素未给予足够的注意，因此不利于全面揭示戏剧作为综合艺术的固有属性及其发展的内在规律。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叶长海先生撰写的《中国戏剧学史稿》，张庚、郭汉城先生主编的《中国戏曲通论》先后问世，对

^① [日]根山彻：《赵山林著〈中国戏曲观众学〉》，日本九州大学文学部编《中国文学论集》第 21 号，1993 年，第 69~78 页。

^② 于魁智：《浅议京剧市场》，《彩虹集》，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1 年，第 9~11 页。

中国戏剧学研究作出了重要的开拓作用,对我有很大启发。我追随诸先进,在大量占有资料、进行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先后撰写了《中国古典戏剧学的历史分期与理论框架》《中国戏剧观念的演变历程》《中国古典喜剧理论初探》《中国古代、近代悲剧理论概说》《中国古代戏剧表演学的理论体系》《古代戏曲理论中的“游戏说”》《古代曲论中的“本色论”》《古代剧论中的人物形象论》《古代曲论中的艺术风格论》《二十世纪前期的中国戏曲研究》等一系列论文,在此基础上于1995年出版了专著《中国戏剧学通论》,从另一个角度对中国戏剧学进行探索,为运用中国理论“话语”建设中国民族戏剧理论略尽绵薄。

该书根据中国戏剧学的实际,以戏剧史学、戏剧作法学、戏剧音律学、戏剧表演学、戏剧批评学、戏剧文献学作为中国戏剧学的六大分支,用以覆盖中国戏剧学的主要领域,力求反映戏剧作为一门综合艺术的一般规律,同时又体现中国戏剧学独特的民族个性。

该书指出,这六大分支,分别隶属于三个层面:一度被人们忽略的戏剧文献学,当属第一层面,乃是整个中国戏剧学研究的基础;属于技法研究的戏剧作法学、音律学与表演学,乃是第二层面;至于研究戏剧发生、发展规律及原理、本质的戏剧史学与戏剧批评学,则为第三层面。三个层面的关系,是紧密联系、相辅相成的。依据以上认识,该书在结构上改变按时代、人物划分章节的传统做法,采用板块构架、点面结合的形式,为复杂的内容勾勒出了清晰的眉目。而隶属各分支的“说”与“论”,充分体现了该书以理论探索为核心的主旨。

以戏剧批评学为例,将有关戏剧功能的主张区分为“讽谏说”“教化说”“主情说”“史鉴说”“游戏说”五类,将有关戏剧艺术表现的见解区分为“自然说”“意境说”“本色论”“当行论”四类,而后就各个中心明确的板块,分条加以评析,阐明诸家理论见解的异同与继承发展的关系。对于批评文体,也进行了梳理和探讨。论者指出:“这种构建中国古代戏剧批评学体系的尝试是值得肯定的。”^①

该书还对一些理论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例如:关于中国戏剧学的分

^① 黄霖主编,黄念然著:《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文论卷》,上海: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第226页。

期；关于中国戏剧产生、发展的具体环节；关于中国戏剧理论中的人物性格论；关于中国戏剧中的悲剧、喜剧；关于中国戏剧学与诗学的关系；等等。

该书出版以后，受到学术界好评。复旦大学李平教授指出该书“是一部具有开创意义的、高质量的学术著作”，并且具体指出其主要特色或曰主要优点有五：一是“以开阔的视野，从全方位、多层次的角度，构建中国戏剧学严密的体系”；二是“构架上以点面结合的形式，为复杂分散的内容勾出了清晰的眉目”；三是“拥有大量独到的见解与对理论意蕴的深入阐发”；四是“突出了中国戏剧学的民族特色”；五是“以广博而扎实的材料，显示了作者厚实的根底和严肃勤奋的治学态度”^①。《人民日报》《文学遗产》《学术月刊》《文汇读书周报》等报刊先后发表了10多篇评论。

在总结20世纪学术史的时候，一些专家也对该书给予了好评。叶长海先生指出：“在中国戏剧学的建设上，赵山林的《中国戏剧学通论》，亦是一个重要的收获”，“该书的主要特点，是把中国古代戏剧学的内容划分为六个门类，每个门类采用‘减头绪，立主脑’的论述方法，择选每个历史时段的主要问题论述之，因而全书讨论的问题集中、醒目，条理清晰、明确”，“进而科学总结，详加阐说，从而为认识中国戏剧学提供了一个清晰的面容”^②。安葵先生指出：《中国戏剧学通论》“这部著作虽然主要列举古代例证，没有直接结合现代的创作，但已不只是对古典戏剧理论的诠释，可以看出作者运用中国理论‘话语’建设中国民族戏剧理论的努力”^③。

三、坚持词曲融会贯通的研究

多年来，分门别类的文学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随着研究的深入，综合的、融会贯通的研究也日益显示出它的重要性与优越性。这种融会贯通的研究，其实学术前辈也曾经提倡，例如词曲双修，就是吴梅先生指示的治学门径之一。有鉴于此，30多年来我比较多地致力于词曲演变发展与相

^① 李平：《一部高质量的戏剧学著作》，《学术月刊》1996年第8期，第109~110页。

^② 叶长海主编：《中国戏剧研究》（“二十世纪中国人文学科学术研究史丛书”之一），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58页。

^③ 安葵：《戏曲研究五十年——为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五十周年作》，《艺术百家》2001年第4期，第21页。

互影响的考察,力求从词曲关系的角度切入,对戏曲研究作出某一方面的拓展。

在《从词到曲——论金词的过渡性特征及道教词人的贡献》(原载《山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2期)一文中,我提出从宋词到元曲的演变过程中,金词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中间环节。这种过渡性的变化表现在由词体到曲体、由词境到曲境两个方面,而以蔡松年、赵秉文、元好问为代表的文士词人和以王重阳、马丹阳、丘处机为代表的道教词人分别作出了各自的贡献。

在《金院本补考》(原载《文学遗产》1997年第5期)、《宋杂剧金院本剧目新探》(原载《南京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二文中,我对宋杂剧、金院本与词的关系进行了具体的考察,指出二者的关系不仅在曲调上,而且在题材上都有所体现。例如金院本中的题目院本,胡忌先生《宋金杂剧考》推测其内容“大约是以公卿、名士和官妓们做对象的”^①,我的论文不仅证实了这一论断的正确性,而且更加具体地指出:题目院本与词人、词作的关系极为密切,金院本中的《墙外道》《共粉泪》《蔡消闲》《方偷眼》《隔年期》《贺方回》都取材于词。这是因为词的内容常有关风情,容易引起人们的兴趣,而词本身就是歌唱的,实现从词到曲的转换也颇为便捷。此外,院本中的《不掀帘》、拴搐艳段中的《少年游》也可以作为这方面的例证。由此可见,开展词与曲的关系研究是极其必要的。

在《试论〈草堂诗余〉在明代的流传及词曲沟通的趋势》(原载《文艺理论研究》2010年第4期)中我指出,词选《草堂诗余》在明代久盛不衰,可以引出多种理论解释,包括词之正宗论、音律典范论、诗歌精品论、应歌范本论等,本文认为这些观点并无严重冲突,而是反映了不同的审美追求,可以概括为“爱文者喜其词,知音者赏其律,应歌者利其用”。也可以认为,《草堂诗余》树立了雅俗共赏的典范,其意义不可低估。《草堂诗余》的流传还不能忽略音乐的因素,本文以流传到日本的《魏氏乐谱》为依据,探讨了《草堂诗余》的音乐流传问题。从文学艺术的发展来看,《草堂诗余》的广为流传反映了词曲沟通的趋势,本文以剧作、曲选、曲论为依据,对此进行了探讨。从剧作来看,戏曲作品大量运用《草堂诗余》中的词。以毛晋所编《六十种

^① 胡忌:《宋金杂剧考》,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207页。